



国学名著讲读系列

顾问 王元化
主编 胡晓明

诗经讲读



刘毓庆 杨文娟 著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

一部诗集成为至高无比的经典，并非因为儒家牵强附会的解释，而是自身具有永恒的价值。自它问世以来，「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义」成了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风（国风）和雅（大雅、小雅）成了诗的最高典范。





国学名著讲读系列

顾问 王元化
主编 胡晓明

诗经讲读

刘毓庆 杨文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讲读/刘毓庆,杨文娟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05.6

(国学名著讲读系列)

ISBN 978-7-5617-5899-1

I. 诗… II. ①刘…②杨…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199 号

诗经讲读

主 编 刘毓庆 杨文娟
组稿编辑 曹利群
文字编辑 姜汉椿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34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899-1/K·301
定 价 2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王元化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绝的新机会。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

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目 录

序	王元化(1)
《诗经》导读	(1)
一、《诗经》的结集及其文化意义	(1)
二、《诗经》的特色及其文学贡献	(4)
三、《诗经》所体现出的诗歌潮流的三次变迁	(8)
四、《诗经》研究史的变迁	(11)
五、《诗经》研究的偏失与新出路	(14)
一、婚恋篇	(18)
关雎(周南)	(18)
桃夭(周南)	(24)
汉广(周南)	(26)
江有汜(召南)	(30)
野有死麇(召南)	(32)
匏有苦叶(邶风)	(34)
静女(邶风)	(36)
新台(邶风)	(38)
桑中(鄘风)	(40)
蟋蟀(鄘风)	(42)
淇奥(卫风)	(44)
氓(卫风)	(46)
木瓜(卫风)	(50)
大车(王风)	(52)
将仲子(郑风)	(53)
女曰鸡鸣(郑风)	(55)
狡童(郑风)	(57)

2 诗经讲读

褰裳(郑风)	(58)
风雨(郑风)	(59)
子衿(郑风)	(61)
野有蔓草(郑风)	(62)
溱洧(郑风)	(64)
鸡鸣(齐风)	(65)
绸缪(唐风)	(67)
蒹葭(秦风)	(69)
月出(陈风)	(71)
候人(曹风)	(72)
黄鸟(小雅)	(73)

二、祭歌篇 (75)

楚茨(小雅)	(75)
清庙(周颂)	(78)
天作(周颂)	(79)
思文(周颂)	(80)
有瞽(周颂)	(81)
潜(周颂)	(82)
闵予小子(周颂)	(83)
那(商颂)	(84)

三、史诗篇 (86)

大明(大雅)	(86)
緜(大雅)	(89)
皇矣(大雅)	(94)
生民(大雅)	(98)
公刘(大雅)	(104)
江汉(大雅)	(108)
常武(大雅)	(110)
玄鸟(商颂)	(112)
长发(商颂)	(114)
殷武(商颂)	(116)

四、燕饮篇 (119)

- 鹿鸣(小雅) (119)
- 常棣(小雅) (122)
- 伐木(小雅) (125)
- 鱼丽(小雅) (128)
- 湛露(小雅) (129)
- 桑扈(小雅) (130)
- 宾之初筵(小雅) (131)
- 瓠叶(小雅) (134)

五、役行篇 (136)

- 卷耳(周南) (136)
- 击鼓(邶风) (138)
- 雄雉(邶风) (140)
- 伯兮(卫风) (141)
- 君子于役(王风) (143)
- 扬之水(王风) (145)
- 陟岵(魏风) (146)
- 鸛羽(唐风) (148)
- 小戎(秦风) (149)
- 东山(豳风) (151)
- 采薇(小雅) (154)
- 四月(小雅) (156)
- 北山(小雅) (158)
- 采芣(小雅) (160)
- 何草不黄(小雅) (161)

六、农事篇 (163)

- 葛覃(周南) (163)
- 芣苢(周南) (165)
- 標有梅(召南) (168)
- 七月(豳风) (169)
- 甫田(小雅) (173)
- 大田(小雅) (175)

载芟(周颂)	(177)
良耜(周颂)	(179)
七、牧猎篇	(181)
驹虞(召南)	(181)
大叔于田(郑风)	(182)
还(齐风)	(184)
车攻(小雅)	(185)
吉日(小雅)	(187)
无羊(小雅)	(188)
八、怨刺篇	(191)
相鼠(邶风)	(191)
黍离(王风)	(192)
兔爰(王风)	(193)
正月(小雅)	(194)
十月之交(小雅)	(198)
雨无正(小雅)	(201)
小旻(小雅)	(204)
巧言(小雅)	(206)
巷伯(小雅)	(208)
大东(小雅)	(210)
荡(大雅)	(213)
桑柔(大雅)	(216)
瞻卬(大雅)	(220)
召旻(大雅)	(222)
九、祝颂篇	(225)
樛木(周南)	(225)
南山有台(小雅)	(227)
天保(小雅)	(228)
斯干(小雅)	(231)
棫朴(大雅)	(234)
旱麓(大雅)	(236)
灵台(大雅)	(237)

卷阿(大雅)	(238)
十、杂感篇	(242)
绿衣(邶风)	(242)
凯风(邶风)	(243)
北门(邶风)	(245)
墙有茨(邶风)	(246)
君子偕老(邶风)	(248)
硕人(卫风)	(250)
猗嗟(齐风)	(252)
园有桃(魏风)	(254)
伐檀(魏风)	(256)
蟋蟀(唐风)	(258)
葛生(唐风)	(260)
采芩(唐风)	(262)
渭阳(秦风)	(263)
权舆(秦风)	(264)
隰有苕楚(桧风)	(265)
蓼莪(小雅)	(265)
附:阅读参考书目	(268)

《诗经》导读

今天,无论哪一部中国文学史,也不管是高中或是大学教材,凡是介绍《诗经》的文字,几乎都会明确地告诉你:《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如果再介绍深一点的文字,便会进一步告诉你:以前的经学家给《诗经》上面加了许多政治教化的内容,掩盖了《诗经》的本来面貌。只有以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诗经》才算是恢复了本真。但是要知道,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诗经》却是以“经”的绝对权威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她对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影响主要在“经”而不在“诗”。如果我们简单的仅仅以“文学”来对待,她的文化意义必然要受到巨大损伤。因而现在我们需要面对历史与现实,对她做出客观的分析、认识与重估。

一、《诗经》的结集及其文化意义

就从《诗经》的产生而言,虽然她的每一篇其本质都是文学的,然而她的结集,她的权威性、神圣性的出现,她的广泛影响,却是与周代礼乐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她不仅表现了周代礼乐制度笼罩下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了礼乐文明即“周代理性精神”激荡下的人们的种种思考和心灵感受,同时她是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部分而产生、而存在的,她的各篇诗歌,都是配合着“周礼”而演唱或演奏的。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诗,这是不能含糊的。在大学,作为学习《诗经》的一般知识必须要知道的是:“《诗经》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存目311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辞。共分风、雅、颂三部。其中《风》诗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鲁》、《商》三颂,有诗40篇。《诗经》诗篇所产生的地域,大略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及湖北、安徽北部等地。其作者成份很复杂,有民间歌手,也有文人之作;作者的身份有帝王和朝廷重臣,也有宦官、走卒和农夫、农妇。”然而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地域分布如此之广,在人类物质财富尚不发达、靠竹简艰难地

记录语言的时代(在当时抄录一部《诗经》所耗财力、人力,必然是很大的),如果不是礼乐制度的需要,不是出于政治功利目的,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为一部“纯文学”的集子、为简单的情感抒发,去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一项对国计民生没有意义的工程的。因而我们说,《诗经》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文学启动的。

关于《诗经》的结集,古人认为有两次。《毛诗序》与郑玄《诗谱序》,都把《诗经》分成了正、变两个部分。郑玄曾明确地指出,“正经”部分(即《二南》、《周颂》、《小雅》中的前十六篇,《大雅》中的前十八篇)产生在王道兴盛的周朝初期,是成王、周公时就编定的。“变经”部分(“正经”之外即为“变经”)则是周懿王之后王道衰微的产物。但王道虽衰,王泽未泯,人尚知“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序》)。“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诗谱序》)。这两次,无论哪一次编辑,其目的都不在“诗歌总集”,而是认为:一部《诗经》所体现出的就是“王道”与“王泽”,它是人间一种正气、真情的荡漾。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大意义。

但正、变的观念,在现存《诗经》文本中并看不出来,因此现在大多数学者不相信也不采用这种说法。一般认为这些诗有两个来源,一是“采诗”,即由官方派出的专门人员从民间采集来的诗;一是“献诗”,是公卿大夫提供的。这些诗汇集到了周太师那里,被编成了诗集。但无论是“采诗”还是“献诗”,同样其目的都不在“文学”。采来的诗,要由太师配上乐,演奏给天子;公卿献诗,也是要工师们演唱给天子的。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采诗”是为了观民风,知得失;献诗是为了规谏王者,补察时政,都是有政治功利目的的。

在春秋时代列国间就流传着一个《诗》的本子。当时赋诗、引诗之风盛行。在外交场合上,各国诸侯和使臣为了政治目的举行聚会,往往要赋诗言志。似乎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可以在诗礼赋咏中不知不觉地获得解决。如《左传·文公十三年》:

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在这里,双方似乎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实际上在《诗》礼往复之中,暗自交锋了两个回合。郑国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文公辛苦一趟,到晋国去说情。赋《鸿雁》诗,义取诗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两句,意思是要鲁国可怜他。季文子代表鲁文公赋《四月》,义取篇中“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几句,意思是说:文公远行跋涉,太劳累了,想回家。这等于拒绝了郑国的请求。郑国的子家赋《载驰》之四章,义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两句,意思是:郑国是小国,有急难,不找鲁帮忙再去找谁呢?这简直有点跪下来哀求的意思。季文子赋《采薇》,义取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二句，意思是：好吧，就为你再辛苦一趟。“诗拉沓称引，各个不言而喻，而当时大国凭凌、小国奔命之苦，凄然如见”^①。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各国使臣赋、引诗篇，基本上都集中在《周颂》、“二雅”、“二南”、“三卫”中。《左传》记载赋诗引诗约 180 余次，就有 154 次在这个范围内。这反映了当时通行的《诗经》本子的内容。虽然也有偶及《郑》、《唐》、《秦》诸国风者，但属特例，因为《郑风》只有郑人赋，《秦风》只有秦人赋，《唐风》是为晋人赋^②。当时在各诸侯国的乐师手里，也保存着通行本没有的一些诗，如鲁国乐师保存的诗乐就比较多，只是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因此未能被广泛引用。

关于《诗经》的最后编定，我们看到最多的记载是“孔子编诗”说。这几乎是汉代人的一致共识。如《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是说，孔子时见到的诗有三千多篇，其中有相当多是重复的，还有些是残篇断简无法演奏、不能用于礼乐的。于是孔子一是“去其重”，把重复的、大同小异的去掉；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将能用于礼乐者取出，如此而得者不过三百余篇而已。关于这个记载，后来人怀疑者甚多。但根据刘向校书的情况看，司马迁之说是可信的。刘向校书时，从各方搜集到的荀子文章有 322 篇，因重复去掉的就有 290 篇，最后定著只有 32 篇，所剩也只有十分之一。搜集到管子文章共 564 篇，去掉重复的 484 篇，定著 86 篇，所剩还不到六分之一^③。这样看来，孔子编《诗》，十去其九，完全是情理中的事。

孔子编《诗》，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一项蕴含着巨大文化意义的事业。在孔子看来，《诗经》是以周代文化为基本内容的华夏传统文化最可靠的载体。周文化是在对夏、商文化的继承、损益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礼乐文明为主体，以人伦道德为核心，呈现出了温情脉脉的特点。但春秋时代，这一文化传统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华夏集团内部的礼崩乐坏，二是四夷交侵，对华夏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自觉地肩负起了“复兴礼乐”与“承传文化”两项巨大的使命。他一方面建立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使这个经过数千历史洗练的文化传统能得以延续；一方面则积极做着正兴礼乐的努力。而这二者在《诗经》的编定中获得了统一。《诗经》的编定，是奠基这个“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最重要的一步工程。《诗经》不同于《书》、《易》的庄重

① 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 2 页。

② 请参考《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诗经〉溯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1958 年影印本第 332 页。

与神秘,也不同于《礼》、《乐》的制度性与目的性,它是民族心灵世界的自觉表达,运载着民族的情感、精神、气质、心理、意识、观念、思想、价值判断等一切内在于人的东西,是民族文化精神最具体、最形象、最深刻地展示。在中国文化的承传中,它不单纯可以传递一种文化知识,而且还有“兴、观、群、怨”的功能。它凭着一种情感力量,能唤起华夏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调动起群体的民族情绪,并使华夏文化以鲜活的状态影响多种文化群体,使之接受这一文化体系,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同时,《诗经》又是一部乐歌总集,是复兴礼乐的根据。孔子编《诗》之所以要“取可施于礼义(仪)”,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实际上就是要复兴礼乐制度,法文、武、成、康之道,再致盛世。正因如此,所以在“六经”中,孔子最看好《诗经》。《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论《诗》引《诗》的就多达十六条;先秦其他典籍如《左传》、《礼记》等载及孔子及其弟子言《诗》的也不下百余条,而且孔子还把《诗》强调到不学习它就不会说话、不知道怎么做人的程度。

虽然孔子复兴礼乐制度的希望未能实现,而其建立的以《诗经》为代表的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尽劫难,然而没有在劫难中消亡,反而更加壮大,就是因为有这个经典文化体系的存在。无论是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还是满洲人,他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最终又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将自己化于无形。可以说,没有这个经典体系,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二、《诗经》的特色及其文学贡献

“三百诗人岂有师,都成绝唱沁心脾。”《诗经》艺术之妙,为历代所称颂。就其特色而言,约略有四:

一、从精神本质上看,《诗经》最显著的特色是现实精神。《诗经》绝少幻想色彩,而多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描写。它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以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存的人们的真实感受。像《国风》,或写婚恋,或写田猎、畜牧、采集以及行役、出征等,所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与实实在在的人。虽说写到得意之处,也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如《桑中》,言“云谁之思,美孟姜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反复申说:“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毕竟没有超越现实,没有像《离骚》那样,幻想与远古的神女恋爱。像《邶风》中的《鸛鸣》这样的禽言诗,乍看起来,颇有浪漫色彩,可是它所叙述的事情,所讲的道理,所表现的情感,都是非常现实的。《颂》诗部分虽说多与祭祀相关,是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联系,但却“敬鬼神而远之”,人始终与神保持着距离。因而这些颂诗,表示的是人对神的敬畏与祈求,是立足于现实

立场上对神的期盼。《雅》诗中的叙事诗,虽说也有像《生民》那样的神话史诗,但它记述的是一个传自远古的神话故事,是作为历史故事认真记述的,并不存在作者任意编造、虚构的问题。至于《风》《雅》中的讽刺时政的诗,特别是二《雅》中的政治讽刺诗,其现实精神体现得就更为突出了。

二、从感情基调上看,《诗经》基本上所表达的是欢乐的情调。虽然其中也有些严肃庄重的作品,如《雅》、《颂》中关于祭祀的庙堂之歌;也有些“怨诽”之作,如二《雅》中忧时伤乱的诗篇。但就其整体而言,诗人们对生活是热情的,乐观的,充满希望的。像《硕鼠》篇,虽是对现实生活极端不满,可却没有绝望,而是表现出了对“乐土”的向往;《伐檀》篇虽是对“不稼不穡”的不满,可从“坎坎”之声中,却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劳动创造世界的赞美;《七月》篇虽写的是一年的劳苦,可在年终的“朋酒”中,却有获得了“万寿无疆”的快乐;《节南山》虽说是情绪激愤,骂权贵尹氏有些不留情面,可最终却表达了“式讹尔心,以畜万邦”的希望。像《邶风·北门》《大雅·桑柔》等篇,在发泄不满情绪中,又把现存的不合理现象紧结到了天命上,以此来化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读《诗经》,明显地感到其中没有《楚辞》的那种偏激。《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之所以用“温柔敦厚”概括《诗》教的作用,就是因为《诗经》中有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力量,足以感化人心,化解人心中的不平与悲伤。

三、从语言风格上看,《诗经》所呈现的是自然质朴之美。它朴素、自然,纯为天籁。《采芣苢》,通篇十二句,只在“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两句上反复,每反复一次,改动一字,不见一丝刀迹斧痕。像《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反复对话,平淡如水,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大雅》中的诗,如《烝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虽略带着几分文雅,但也只是辞达而已。有时也有铺张,如“揅之陟陟,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邶》)之类,但也表现得很自然,犹如水入石滩,虽有波澜,而无着意修饰的痕迹。故元张观光《论诗》说:“三百余篇岂苦思,个中妙处少人知。籁鸣机动何容力,才涉推敲不是诗。”

四、从艺术手法上看,《诗经》最突出的特色是比兴。比即以彼物比此物,兴是托物起情。比、兴像两把金梭,织出了东周诗坛的春天。据学者们的研究,《诗经》中有明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之类;有隐喻,如“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之类;有借喻,如“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有比拟,如“隰有萋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之类。关于兴,学者们又分为起情不取其义的兴,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之类;有比喻意义的兴,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有渲染气氛的兴,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类。《诗经》305篇,毛氏标兴的有116篇。毛氏未标而郑玄以兴作解的还有若干篇。至于

比,那就更多了。因而比兴成了《诗经》艺术的一个亮点,为历代学者所乐道。

闻一多先生也说过:“《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①

《诗经》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其要者而言之,大略有五:

一、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打开世界各民族诗歌史的第一章,我们看到许多民族都是以史诗开场的。如巴比伦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希腊有《荷马史诗》,英格兰有《贝奥武夫》,法兰西有《罗兰之歌》,德意志有《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有《伊戈尔远征记》……而我们则是以简短的抒情诗讴歌生命。《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抒情的。十五《国风》,实际上就是十五组抒情诗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等几篇,被后人视为周民族的史诗,这是在《诗经》中叙事成份最多的几篇。但严格地说,都不是纯粹的叙事诗。作者是充满着对祖先的崇拜、虔诚与敬爱来讲历史的。因而在叙述中,散发出浓郁的主观抒情气息。这就形成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特色的基本传统,直接影响到了古人的诗歌观念与二千年诗歌的历史。陆机《文赋》即言:“诗缘情而绮靡。”清宋荦《漫堂说诗》更说:“诗者,性情之所发,《三百篇》、《离骚》尚已。”在这一观念中,叙事被排斥在了诗之外。二千年文学史,诗人从头唱到尾,唱出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中国文化的一片祥和。

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府库。《诗经》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它们所创造的文学语言与语汇,要多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作品。有人统计,仅《诗经》单音词就有3900个,复合词1000个。这些词都是原创性的,且对事物的表达亦甚精确。如表示手的动作,就有采、掇、捋、擷、挹、拊、折、投、搗、搔、执、搔、揭、扫、抱、击、拔、招、按、提、挠、授、拾、抽、掺、持等数十个单词,以表达手的数十种不同状态。仅马的品名,就有骐、骠、騊、駼、驪、騊、骥、骠、鱼、馵、馵、馵、馵、馵、馵、馵、馵等十数种。还创造了大量的形容词、成语等,如驰驱、匍匐、窈窕、辗转、翱翔之类,以及一日三秋、二三其德、高高在上、爱莫能助、爱屋及乌、忧心忡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巧言如簧、天作之合等等。中国的成语绝大多数为四言,显然与《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有关。而且可以说“四言”句式的奠定,是《诗经》对中国文学语言贡献最大的一点。四言句式乃出于人对于自然韵律的感悟。关关、嚶嚶、交交、呦呦,这

^① 《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三联书店重印本第202页。

是来自自然的声音,传递的是自然界生命的信息,然而它过于简短,构不成节奏,形不成韵律,自然也不是艺术。双声相叠,便有了节奏,有了韵律,便成了艺术,而且与来自自然界的那种明快的声音相呼应,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甜美。于是四言就构成了艺术语言的最小单位。同时这种句式,既不失诗的韵律,也有很强的介入散文文体的能力。融入文中,则使文具有了诗的美感。

三、孕育了多种诗体的语言形式。《诗经》以四言为主,但同时为了表达之顺畅而自由变化,随意伸缩,于是在诗歌韵律的规范下,又创造出了多种语言形式。如有一言句:“敝,予又改为兮……还,予授子之餐兮”(《郑风·缁衣》);有二言句:“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有三言句:“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鲁颂·有駟》);有五言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有六言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有七言句:“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螽斯》)。丰富的语言形式,孕育了多种诗体。

四、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比兴艺术。比兴是中国诗歌一种特殊的创作方法,故《文心雕龙》中专列有《比兴》一篇。所谓比兴,其实就是“立象以尽意”的创作艺术。《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有些事物,用抽象的语言很难表述清楚,如用一种形象来比喻或象征,意义便会呈现出来。《周易》中有“易象”,这“象”便是为“尽意”而设的。诗歌中的比兴与《易》中的“象”是相同的,故宋儒陈騄《文则》(上)说:“《易》文似《诗》”,“《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清儒章学诚说得更明白:“《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比兴不仅能将语言难以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还可以使诗篇变得形象生动,婉转含蓄。如《东山》诗:“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这里是用野蚕蜎屈野外桑田的情景比喻士兵野宿,虽不言行军之苦,但风餐露宿之苦已在不言之中了。这种艺术表现,直接为后世诗赋创作所继承,成了中国诗歌有别于他国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五、树立了诗预时政的诗歌典范。在最早的诗学理论《诗序》中,就把三百篇与“王道兴衰”联系在了一起,反映了中国诗学发轫期的诗学观念。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诗歌创作。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诗经》的《雅》、《颂》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直接干预时政的诗篇,有的是从肯定的角度正面参与的,如《颂》诗及《正雅》部分,这部分诗以歌颂为主,肯定了现存政治及统治的合理性。有些则是以否定的态度干预政治的,古人称这部分诗为“怨刺诗”。怨刺诗大约占到了《雅》诗的三分之一,这些诗刺的对象,上不避王公,下不避庶人;刺的方式也是或冷嘲热讽,或直刺无隐;刺的目的并不单纯在发泄,而是望其一反于正。《诗经》这种政治情怀与干预时政的创作倾向,为中国诗歌树立了以天下苍生为怀的典范,由是而形成了中国诗歌思想的主流。